

一个童第周， 77位教授

□童建国/口述
杨小梅 陈化贤/整理



童建国(雅渡 摄)

1 童村的“阿蔚”

浙东董山脚下，弦溪穿村而过。小小的童村藏着一个传奇：一个两千多人的山村，先后走出77位教授，被誉为“教授村”。中国实验胚胎学奠基人童第周，就诞生于此。

课本上的童第周，是赫赫有名的科学大家；可在童村老一辈乡亲们眼里，他只是那个小名唤作“阿蔚”（他的家族排号）的本村后生。

近50年前，当时的童村大队书记童建国与同村人童祖年跨越千里，坐船坐绿皮火车进京，亲眼见到了童第周。没有实验室里的高深理论，一顿家常午饭、一句宁波乡音，成了老人一辈子的记忆。

近日，八旬老者坐在老屋里，用地道的宁波话，为我们还原了这位科学家鲜为人知的温热烟火的一面。

我叫童建国，今年81岁了。老屋窗外就是弦溪，不远处那棵老香樟树，风一吹，树叶沙沙响，好听得哩。外人来童村，都说这里是“教授村”；提起这个名头，绕不开一个人——我们村里出去的童第周，老辈人习惯叫他“阿蔚”。

很多人是从教科书上认识他的：实验胚胎学奠基人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，名头很大。可在我们童村长辈眼里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大院士，就是从童家岙走出去的后生晚辈。我年轻的时候不懂那些专业头衔，只晓得，他是村里读书最厉害、出息最大的人。

老辈人嘴里，流传着童第周小时候的故事。村口有条独木桥，底下溪水哗哗奔涌，别家小孩走到边上，腿都吓得发抖，唯独五六岁的“阿蔚”，来来回回走得稳稳当当，跟没事人一样。老人担心地喊：“阿蔚，阿蔚，小心摔着！”他还是顺顺利利地走过去，只觉得有趣得很。老人们就议论：这孩子胆子大，心里稳，将来能干出一番事业。

可童第周读书起步并不顺。17岁去效实中学插班，刚进去是班里倒数第一，第一学期平均分才45分，校长找他谈话，说再跟不上就要留级。他父亲走得早，兄弟5个，家境困难，哪里愿意留级耽搁？那之后，学校路灯下常见他读书的身影，夜夜读到深更半夜。肯下苦功到底有用，第二学期几何考了满分，平均分一下子冲到将近70分。校长说，教了一辈子书，很少见进步这么快的学生。这就是我们童村人的脾气，认准一件事，就要争一口气。

童家历来看重读书。他父亲是村里私塾先生，童氏五兄弟——童第锦、童第德、童第谷、童第周、童第肃——个个读书成才，乡里叫“五子登科”；传到“中”字辈、“和”字辈，三代出了二十多个读书人。《童氏宗谱》写着“积德之家，好书广读”，不是写写摆样子的，是一辈辈实实在在传下来的。

2 千里进京见亲人

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童第周，是1977年夏天。那年我30岁出头，和同村童祖年一合计，想去北京看望他。怎么去的？先从宁波坐船到上海，船票三块六，夜里上船，海上晃荡一宿，天亮到十六铺码头；再坐绿皮火车进京，咣当咣当跑24小时，硬座挤着，困了靠着椅背眯会儿，饿了啃几口自带的干粮。那时不觉得苦，心里头高兴——能去北京见童第周，那是多大的事儿啊。

我们带了自己炒的茶叶，大约两三斤，还带着全村人的期望。到了北京，人生地不熟，又担心两个宁波乡下人一口浓重的乡音，怕是连话都说不利索。好在自家兄弟童中杰在北京部队当兵，已是少将，他答应引路，带我们去见童第周。

海淀中关村69号，中国科学院一处老院子里，我记得是当时童第周的家。房子不大，收拾得干净利落。见到我们，童第周高兴得不得了，开口第一句话说的是宁波话：“阿拉村口那棵香樟树还在不在？”我鼻子一下子就酸了。人离开家乡几十年，当了这么大的领导，心里记挂的还是村里溪坑旁、小学边上的那棵老树。我赶紧回他：“在的，长得好好的。”他满意地笑了。

那天中午，他一定要留我们吃饭。那时物资紧张，大米凭票配给，就算他是副

院长，家里也不宽裕。为招待我们，他和家人忙了一上午，摆上满满一桌菜，一个劲儿叫我们多吃，还给我们夹菜。他自己不抽烟，特意找出琉璃烟灰缸放在桌上给抽烟的人用。他身体已经不大好，有午睡的习惯，那天却跟我们唠家常，连午觉都不睡了。

他问起村里的事：赤董小学怎么样，谁家孩子读书考到哪里，村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挂念。院子角落摆着几口缸，养着金鱼，我随口说这鱼怕有十几斤，他听完哈哈乐了：“哪有这么大，三四斤，最多五六斤。”

那次去北京，我还带着村里的任务——村里想办胶木厂，原料胶木粉不够，想托他想想办法。他想了想，很抱歉地说胶木粉帮不上忙；不过那时全国粮食困难，家乡也缺粮，种优质高产的红薯能解决困难。后来他真从杭州捎回红薯苗寄到村里，村里交给牧场去种，可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搁下了。童第周搞了一辈子科学，看事情比我们远、比我们准，他指的道儿，肯定是对的。

临走时，他送了我们两包中华烟。他自己不抽烟，可晓得家乡来的人抽，特意托家人去买。那次北京相见，成了我和童祖年一辈子难忘的记忆。

3 “教授村”的根

转眼几十年过去。村口那棵香樟树依然枝繁叶茂，童第周故居还在村里，常有各地的人来参观。我一直在琢磨：童村为啥能出这么多人才？

想来想去，头一条就是重视教育。打明朝起，村里就有私塾；新中国成立后，赤董小学一直办到现在，再穷也没让学校荒了。谁家孩子读书有困难，亲戚朋友都帮一把；谁在外头有了出息，回乡一定到村里小学看看，给孩子们讲几句话。重读书、肯吃苦的风气，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。

童第周常挂在嘴边一句话：“愿效老牛，为国捐躯。”这话听着像口号，可他真是拿一辈子去做的。抗战那会儿，他放弃国外的好条件，回到兵荒马乱的祖国；1949年又放弃在美国的研究机会毅然回国。为了买一台显微镜，他变卖家产，四处借钱，一家人省吃俭用十几年才还清债务。他心里装的是国家、是科学，自个儿的事能省就省、能凑合就凑合。

1979年，他在杭州作学术报告，讲到

一半人病倒了，送回北京后，当年3月30日在北京医院离世，享年77岁。本来听说他打算报告做完，回童村看看家乡的，唉，你说可惜不可惜？

如今弦溪的水还在流，村口香樟树还绿着，跟童第周离家那年一样绿。前些年，他的4个子女都回来过，在老屋里走了走、站了站、转了几圈。以前赤董小学每年开学，老师都会给孩子们讲童第周的故事，讲他“一定要争气”的那股劲头，讲他小时候就明白“水滴石穿”的道理。我小的时候，老辈人常说：读书传家，是这个村子的根。现在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也是这么跟村里的小娃娃说的。

你要是问我，童村究竟走出去多少个教授，这么说吧——从20世纪初算起，到如今，童村一共走出了77位教授。

这个数字，是童村人一代一代接过来的，也是童第周用奋斗和奉献的一生，给后辈们回来的那口气。教育是一代一代人的事，我们童村人，把这口气接住了，传下去了。



青山绿水间的童村。